

#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张昭军

**摘要**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

**关键词** 章太炎 史学 现代性 “六经皆史” 民族主义

章太炎不以史学名家,但作为国学大师和学术通人,史学在其学术世界占据重要一席。故朱希祖称:“先师学术,虽极广博,然史学实占其大部分,不特史之本身,即经学、文学,亦包括史学之内,所撰文章,亦多以史为根柢也。”<sup>①</sup>

自 1902 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祭起“史界革命”的大旗,短短数十年,国人即已习惯新旧二分。周予同 1941 年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把章太炎与黄宗羲、钱大昕并列,归入旧史家营垒。四年后,朱希祖发表《章太炎先生之史学》,则把章太炎归为新史家。言新言旧,后来各有一批支持者。笔者以为,新旧歧见,或许正意味着章太炎于新于旧,不轻易附和。他的史学思想,一如其小学、经学、子学、佛学思想,既相对独立,又道通于一,必须结合具体语境和言说对象予以分析。

本文重点分析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之间的关联,探讨其史学思想的独步之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以“依自不依他”为总体风格之一,这在他处理中国之史(学)与西方现代性观念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得相当突出。“依自不依他”,源自他的佛学、庄子和经史研究,反过来,又强化了他对中国史学现代化之独特道路的认识。他从“六经皆史”说出发,以“历史民族之义”为内核而形成的民族主义史学,就是例证。无论是“六经皆史”说还是民族主义史学,在他那里,均表现出个性化色彩。历史(学)传统悠久的中国如何迎接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他的回答耐

<sup>①</sup>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原刊《文史杂志》1945 年第 5 卷第 11、12 期合刊,今据《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7 页。

人寻味。

## 一、“依自不依他”

章太炎对西洋的史学理论经历了从追随、效仿到反思、批判的过程。他系统接触西学是在维新变法时期。1897年,他所持论仍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sup>①</sup>。他参编《时务报》,后又主笔《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思想有了变化,始发愤汲取西学。变法失败后,他亡命台湾,再迁日本,对西学的认识大为深化。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儒术真论》、《视天论》、《菌说》,向往西方的文明和科学,信奉进化论,反对宗教论和鬼神说。1900年,他把《馥书》初刻本及《儒术真论》寄示严复,足见其引以西学见长的严复为同调。

1902年6月,章太炎自日本归国,对所著《馥书》“意多不称”,决定加以删革修订。重订后的《馥书》,较之初刻本,运用西方理论更为应手。正文63篇,涉及学术、社会、人种、民族、宗教、语言、政制、财政、史学、地理等众多领域,就研究对象和主题而言,恰与西方的文明史学保持一致,而不同于中国的旧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重订本《馥书》在价值取向上进一步认同日本和欧洲学者的现代性观念。该书以社会进化学说为指导,对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和儒家学说予以有力抨击。《订孔》篇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所说“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开头,引白河次郎的观点结尾:“纵横家持君主政体,所谓压制主义也。老庄派持民主政体,所谓自由主义也。孔氏旁皇二者间,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此儒术所以能为奸雄利器”。他对这些观点几乎不加反思与分析,甚而极力张扬,认为孔子“闻望过情”,《论语》“暗昧”,《三朝记》“多自触击”<sup>②</sup>。此文被柳诒徵、钱穆等视为清末以来反孔反传统的代表作。章太炎还不加怀疑地引用法国学者科派利(Laconperie,今译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序种姓》篇从人种、氏族、语言、民俗、器物等方面考察中国历史民族特别是华夏族的形成史,说明古代胡汉姓氏的历史渊源。对照当时日本流行的文明史著作,不难发现,《馥书》属于“新史学”范畴。

客观地说,对于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章太炎在理论上确有发凡赞襄之功。他在日本期间购得岸

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归国后译成中文,交由广智书局出版。斯宾塞、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有贺长雄、岸本能武太等人的社会学思想特别是社会进化学说直接影响到了章太炎的史学理论。不晚于1900年,章太炎已有编纂新史的规划。史家金毓黻称:“近人主造新史者,莫先于章太炎先生,曾于所著《馥书》中,撰《中国通史略例》。”<sup>③</sup>《中国通史略例》展示了章太炎意欲以文明史为样本改造书志体进而编写通史的计划:“今修《中国通史》,约之百卷,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智沈,以振墨守之惑;庶几异夫策锋、计簿、相析书之为者矣!”<sup>④</sup>拟修的《中国通史》重在明古今进化之轨迹,章太炎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sup>⑤</sup>。在取材、方法和视野等方面,章太炎主张:“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sup>⑥</sup>。《中国通史》主要还是在学习和模仿西方史学,在此,他对新体裁、新方法、新史料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后起诸君。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民丛报》发表后,他致书梁启超亦道及此事:“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sup>⑦</sup>。对比梁启超的《新史学》不难看出,他们的主张多有一致之处。

《苏报》案牢狱三载,章太炎潜心佛典。佛学胜

- ① 参见《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光绪二十三年条,上海书店1986年版。
- ② 章太炎:《订孔第二》,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135页。
- ③ 金毓黻:《最近史学之趋势》,载《中国史学史》附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
- ④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载《章太炎全集》(三),第329页。
- ⑤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载《章太炎全集》(三),第330~331页。
- ⑥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载《章太炎全集》(三),第331页。
- ⑦ 章太炎:《与梁启超》,载《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义直接影响到他对经学、西学乃至史学的评判。出狱后,1906年7月章太炎第三次东渡日本,主编《民报》,为宣传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引人注意的是,他在大力倡导“排满革命”的同时,对源自西洋的启蒙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发表了《五无论》、《四惑论》、《俱分进化论》、《代议然否论》等一批论文。“昔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曰名分。今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一曰公理,二曰进化,三曰唯物,四曰自然。有如其实而强施者,有非其实而谬托者。要之,皆眩惑失情,不由诚谛”<sup>①</sup>。他指出,“公理公例”取代“天理”而被视作先验性的真理,已变为一些人压制另一些人的强权。“骤言公理,若无害矣。然宋世言天理,其极至于锢情灭性,烝民常业,几一切废弃之。而今之言公理者,于男女饮食之事,放任无遮,独此所以为异。若其以世界为本根,而陵藉个人之自主,其束缚人亦与言天理者相若”<sup>②</sup>。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影响巨大,被年轻一代视为世界观而广为流行。章太炎在分析黑格尔、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进化学说后指出:“若云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则随举一事,无不可以反唇相稽。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sup>③</sup>。他先人一步,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的复杂多样。与此一致,他的学术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今徒远引泰西,以征经说,有异宋人以禅学说经耶?夫验实则西长而中短,冥极理要,释迦是孔父非矣。九流诸子,自名其家,无妨随义抑扬,以意取舍”<sup>④</sup>。他强调,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打破对西方的迷信<sup>⑤</sup>。他解释说:“迷信不是专指宗教一项,但凡不晓得那边实际,随风逐潮,胡乱去相信那边,就叫做迷信。”十几年来,中国人相信欧洲的学问,先是迷信教士,后是迷信严复,接下来又迷信日本的博士、学士,“不是一边的迷信破了,一边的迷信又起么?”<sup>⑥</sup>针对一些人唯西是瞻的做法,他与友人发起国学讲习会,标举国粹主义,力倡结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建构适合中国的现代性。

章太炎认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必须“依自不依他”,以本民族的历史实际为依据。然而,现实状况则是,一些人大谈西方,却连基本的历史常识也没有。他说:“自然晓得本国的历史,才算常识,不晓得

本国的历史,就晓得别国的历史,总是常识不备。但近来人把拿破仑、华盛顿都举得出来了,李斯、范增倒反有举不出的。”<sup>⑦</sup>更可叹的是,一些人不知道“历史本来是方格的,不是圆遍的”,不懂得反躬自求本国的学问,却盲目仪型他国的陋说<sup>⑧</sup>。“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sup>⑨</sup>。他指出,欧洲、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知之甚浅,而一些中国学者不辨是非,致使效颦他人,妄自菲薄<sup>⑩</sup>。

梁启超等师法西方史学而发起“史界革命”,开启了中国史学的现代性;章太炎则是对20世纪初流行的“新史学”最早予以现代性反思和批评者。梁启超等指责中国史书如“帝王家谱”,如“相斫书”,所载皆“邻猫生子”之类,无关紧要。章太炎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只是家谱一样,没有精彩。又说,只载了许多战争的事,道理很不够。这种话真是可笑极了。中国并没有鬼话的宗教,历史自然依帝王朝代排次,不用教主生年排次,就是看成了家谱,总要胜那个鬼谱。以前最好的历史,像《春秋》、《史记》、《汉书》,学术、文章、风俗、政治,都可考见,又岂是家谱呢!后来历史虽是渐渐差了,但所载总不止战争一项,毕竟说政治的得失,论人物的高下,占了大半。讲战争的能有多少呢?可笑那班不识的人,引了一个英国斯宾塞的乱话,说历史载的,

- ① 章太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3页。
- ② 章太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四),第444页。
- ③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载《章太炎全集》(四),第386~387页。
- ④ 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载《章太炎全集》(四),第154页。
- ⑤ 章太炎:《答铁铮》,《民报》14号,1907年6月8日。
- ⑥ 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载《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 ⑦ 章太炎:《常识与教育》,载《章太炎的白话文》,第75页。
- ⑧ 章太炎:《常识与教育》,载《章太炎的白话文》,第75页。
- ⑨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张昭军编《章太炎讲国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页。
- ⑩ 1908年,他在信中说:“日本诸子治汉学者,惟务其义,不务其文,训故未通,而以微言相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章太炎《与梦庵》,载《章太炎书信集》,第233页)他在日本所作讲演《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也说:“且看中国历史一项,一部《纲鉴易知录》,向来中国略读书的人,是看得最浅陋的,但到这边来听的历史,一部《支那通史》,翻来覆去,缭绕了许多,比《易知录》更加浅陋。”(《章太炎的白话文》,第57页)

都是已过的事,譬如邻家生了一只小猫,问他做什么?不晓自己本国的历史,就是自己家里,并不是邻家,邻家就是外国,外国史也略要看看,何况本国史呢!”<sup>①</sup>由此可见,作为现代新史学的提倡者,章太炎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并不轻易附和,盲从成说。

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章太炎进而指出,因果论、进化论、社会学等所谓科学理论也并非无往而不适,新史家的宣传有绝对化、片面化之嫌。他所撰《征信论》一文阐发治史之原则,质疑新史家所说的因果必然性,认为“推校之法”不适于确定历史事状:“且夫因果者,两端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能独生;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端,忘其旁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颠倒而袒裂之,是乃殆以终身,弊之至也”<sup>②</sup>。新史家主历史直线进化,认为“世皆自乱以趋治”,“自质以趋文”。章太炎例举史实,反证古乱今治、古质今文的观点不具普遍性:“治乱之迭相更,考见不虚”;“社会学以辨文野,其说难任,其持之亦无故”<sup>③</sup>。新史家喜标榜理论,以为科学。章太炎驳斥说:“近世鄙倍之说,谓史有平议者合于科学,无平议者不合科学。案: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邪?若夫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如班固、沈约、李淳风所志,亦可谓善于平议矣。而今世之平议者,其情异是。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下者犹近苏轼《志林》、吕祖谦《博议》之流,但词句有异尔。盖学校讲授,徒陈事状,则近于优戏,不得已乃多施平议。而已不能自知其故,藉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sup>④</sup>新史家以西衡中,认为人是而已非,大肆抨击旧史,甚至声称中国“无史”,“史官皆曲笔道谏”。针对此种现象,章太炎指出,“今一切以为诬罔,其非诬罔者当云何?曲者又好举异域成事,转以比拟。情异即以为诬,情同即以为是。……不稽他书,不详同异,衮衮以诬旧史,人之利暗昧而憎明察也,固如是哉!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实录,贵不定之琦辞,贱可征之文献,闻一远人之言,则顿颡敛衽以受大命,后生不悟,从以驰骤,废阁旧籍,鬻为败纸”<sup>⑤</sup>。他提醒青年学子,外国人讲的这个理,“总合不上中国的事,又岂可任他瞒过么?”<sup>⑥</sup>

学界已多有论述,章太炎并不排斥西学。同样,

他强调“依自不依他”,并不是拒绝接受现代性,而是强调实事求是,吸收外来学说必须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正如他在与友人论国粹时所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sup>⑦</sup>这种追求形名相称的学风、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正是史学现代性的要求、科学精神的表现吗?“依自不依他”,他从佛法、诸子学说中提炼出的胜义,与朴学的实证方法结合在一起,既成为他针砭现代史学流行病的理论工具,又强化了他对中国历史独特性和中国史学独立性的认识。“朴学稽之于古,而玄理验之于心。事虽繁熙,必寻其原,然后有会归也。理虽幽眇,必征诸实,然后无遁辞也。以此为则,或上无戾于古先民,而下可以解来世之狂醒乎?”<sup>⑧</sup>这种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根本特点之一。

## 二、“六经皆史”

在近代史学转型期,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备受争议,且影响广泛。学者们对“六经皆史”如何解读,关系到他们对史学现代性的理解和立场<sup>⑨</sup>。其中,胡适以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sup>⑩</sup>。此说虽遭到钱穆等人的反对,但在梁启超、周予同不少看来,“六经皆史料”,才是后经

①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载《章太炎的白话文》,第67页。

② 章太炎:《征信论下》,载《章太炎全集》(四),第59页。

③ 章太炎:《信史下》,载《章太炎全集》(四),第65、68页。

④ 章太炎:《征信论下》,载《章太炎全集》(四),第59~61页。

⑤ 章太炎:《信史上》,载《章太炎全集》(四),第64页。

⑥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载《章太炎的白话文》,第67页。

⑦ 章太炎:《再与人论国书》,载《章太炎全集》(四),第355页。

⑧ 《章炳麟论学集》,吴承仕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页。

⑨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井上進《六经皆史说の系谱》,载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刘巍《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⑩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05~106页。

学时代的现代新史家所应采取的态度<sup>①</sup>。换言之，“六经皆史料”被视作史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众所周知，章太炎也反复讲过“六经皆史”，他的“六经皆史”是什么含义？“史”指的是不是“史料”？如果指的不是“史料”，那么，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是否具有现代性？

从周予同的划分看，章太炎不属于“史料派”，而是“儒教史观派”，属于旧史家的行列<sup>②</sup>。朱希祖则以弟子的身份回忆说：“然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即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亦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特不欲明斥先贤耳。”<sup>③</sup>朱希祖的说法耐人寻味，结合他的另一篇文章《〈文史通义札记〉序》可知，他力主“六经皆史材”，而不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为然，因为在他看来，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乃六经皆史学<sup>④</sup>。由于章太炎力赞章学诚的说法，故他“尝欲将此意质之先师，而未敢也”<sup>⑤</sup>。由此判断，朱希祖与章太炎的观点并不一致，他对章太炎史学思想的理解有一定出入。

朱希祖之后，以章太炎所说“六经皆史”为“六经皆史料”者不乏其人，但仔细推究，章太炎以史书视六经，以治史的方法治经，但绝少主张六经仅是史料。章太炎有关“六经皆史”的言论，主要见于重订本《馥书·清儒》、《国故论衡·原经》、《经的大意》、《信史》、《国学概论》第二章“经学的派别”以及《“经义”“治事”》、《历史之重要》、《关于史学的演讲》、《论经史儒之分合》等文。兹引《经的大意》为例：“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思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捐，《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周礼》有个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古人的史，范围甚大，和近来的史部有点不同，并不能把现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这样看来，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sup>⑥</sup>。这里所说的“历史”、“史”，显然不能理解为史料。他在《“经义”“治事”》一文中说

得更明白：“一般人的意见，往往把经学、史学分而为二。其实，经是古代的史书，史是近代的经书，二者本来是一致的。”<sup>⑦</sup>

“六经皆史”与“六经皆史料”，一字之差，含义却有重大不同。周予同在谈论治经与治史的关系时说：“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诸位大概明白，‘史’和‘史料’是不同的；史料是客观的社会的历程所遗留下来的记录，而史是这些客观的记录透过了史学家的主观的作品！”<sup>⑧</sup>对读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更易明晓，这些新史家认为，史书是有组织、有系统、有精神的，而史料如同博物馆的陈列品，或如同杂乱无章的瓦砾。也就是说，认为“六经”皆“史”反映了一种价值认同，至少承认六经有其学术体系，而认为“六经”皆“史料”则意味着对经书价值的批判和否定。故此，胡适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sup>⑨</sup>周予同主张：“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不循情地消灭经

① 钱穆的观点参见《孔子与〈春秋〉》等文。梁启超认为：“章实斋‘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只六经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宝贵的史料。”（参见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道》，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周予同也“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参见周予同《治经与治史》，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2页）。

②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6～517页。

③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载《朱希祖文存》，第348页。

④ 《朱希祖文存》，第379～380页。

⑤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载《朱希祖文存》，第348页。

⑥ 章太炎：《经的大意》，载《章太炎的白话文》，第82页。

⑦ 章太炎：《“经义”“治事”》，《苏中校刊》第68期，1931年10月。

⑧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622～623页。

⑨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存》第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33页。

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sup>①</sup>简单说,胡适等新史家是要拆毁古史的殿堂,以之作原料,再建西式的大厦,他们的精神气质与前人完全不同。由此也不难判断,主张“六经皆史材”的朱希祖与乃师的观点保持有一定距离。

那么,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是否具有现代性呢?笔者以为,章太炎代表了经史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类型。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与新史学相结合,批评章学诚的正统史观,显然,两人的学说分居一间。这是理解章太炎学说的前提。章太炎虽然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多持肯定态度,但就两人学说的实际内容讲,有着很大不同。章太炎《原经》篇对章学诚的命题提出了批评:“晚世有章学诚,以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此甚非也。他认为,兵书、法律、疆域图亦有称经者,“经之名广矣”。仲尼作《孝经》,汉《七略》始传六艺,其始则师友雠对之辞,不在邦典;墨子有《墨经》;贾谊有《容经》,韩非《内储》、《外储》亦自署经名;老子书有“道经”之称。由此可见,非徒官书称经<sup>②</sup>,“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sup>③</sup>。他又举陈寿、习凿齿、臧荣绪、范曄等人为例,驳斥章学诚“史者不可以私作”之说。他指出,章学诚以“经皆官书”而“史不得私作”,实质上是把治经治史的权力奉给官府,不让“庶士”染指。可见,章太炎的经学观念具有反正统的精神,与章学诚并不一致。如果再联系章太炎对进化论、社会学等理论方法的运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人的思想学说属于同一个时代。

在与廖平、康有为等人的争论中,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的世俗化、启蒙意义不断凸显。康有为等今文经学者以孔子为教主、为改制素王,以“六经”为孔子为后世制法,意在把孔子与经学进一步神圣化。与他们针锋相对,章太炎主张六经皆古史。他一再说:“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人的经。古代撰他当代的史,岂是为汉朝?所说治国的法度,也只是当时现用,并不说后世必定用得着。固然有许多用得着的,但他当时著书,却并不为此。”<sup>④</sup>他还在《订孔》、《驳建立孔教议》等文中多次指出,孔子删定六经,功在保存历史,而不是为百世制法,六经绝非万代尊奉不移的圣经和亘古不易的教条。“《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

甚,更有些近于宗教”<sup>⑤</sup>。章太炎反对圣化、神化、宗教化孔子和经学,非旧史家所能为。再者,他主张“六经皆史”,重在说明:作为史书的六经所揭示的历史具有客观性,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反复强调经史首在辨真伪,与宗教有原则性不同:“周孔的经典,是历史,不是谈理的,所以真经典就是,伪经典就不是。佛经谈理的,不是历史,只要问理的高下,何必问经是谁人所说?”<sup>⑥</sup>这是章太炎有别于康有为的重要观点之一。如果以有待辨析的史料来理解“史”(也就是六经)的含义,六经所揭示的历史真实性必将遭受致命打击,那么,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还有什么力量来反击康有为的“神话预言”呢?

面对胡适等新一代“西化论者”,章太炎提倡“六经皆史”,意在提升经史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时势转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经史之学的地位一落千丈,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运动,以科学和客观的名义,向传统的经史之学发起了猛攻,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因为,当他们破除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框架结构、组织体系,而视之为“乱七八糟”、“无头无脑”、“胡说谬解”的古史资料时,中国历史文化的神韵也就无从说起。进而,他们又以西方的现代性来包装中国的史料,削足适履自是难免。正如金岳霖所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总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不知不觉间流露出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sup>⑦</sup>西方的现代性被视为普遍主义法则,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合理性被严重忽略或错判,历史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等人所标榜的客观性又在哪里呢?退一步说,即便他们得以科学地确立事实,但由于是以主客分离为前提,必然远离了中国

①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623页。

② 章太炎:《原经》,载《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7页。

③ 章太炎:《述书·清儒》重订本,载《章太炎全集》(三),第154页。

④ 章太炎:《经的大意》,载《章太炎的白话文》,第82页。

⑤ 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⑥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载《章太炎的白话文》,第93页。

⑦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经史之学知识与道德合一的传统。就此而言,剥离了儒家精神的古史不过是一副躯壳而已。正是忧心于此,章太炎在“六经皆史”基础上提出“经者古史,史即新经”<sup>①</sup>。

“经者古史”,强调古代经典渊源有自,信而有征;“史即新经”,则是表达对历史的尊崇和敬畏。他与胡适等人争辩的焦点在经史的善恶,即中国历史的伦理功用问题。他说:“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sup>②</sup>他晚年反复倡导读古经旧史,目的就在弘扬中国经史的固有精神。而胡适等人“多持整理国故之说,于继续前人之精神,则罕言之”<sup>③</sup>,甚至主张“打鬼”论。两相对照不难看出,经史寄托了章太炎对中国的信念和希望。观章太炎晚年的演讲录,他不厌其烦地宣讲经史的重要性,主张治史当识大体,而不能一叶障目,因小失大:“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索瘢,此大不可也”<sup>④</sup>。他还以清人治学的弊端来告诫时人:“其所以不能致用者,基于彼等考大体者少,证枝叶者多”<sup>⑤</sup>。又说:“论其大体,则主于《春秋》也。”<sup>⑥</sup>“孔子作《春秋》,确立民族主义;三传释经,虽有不同,而内诸夏外夷狄之义则一。管仲建此功,孔子立此义,以故中国屡亡,而卒能复兴”<sup>⑦</sup>。他尤其反对过度怀疑历史的行为,《国学概论》开篇即有针对性地指出:“经史非神话”,“历史非小说传奇”,“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sup>⑧</sup>他在给柳诒徵的信中点名批评胡适等人:“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证。……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sup>⑨</sup>。他甚至把“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比作魔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其扼杀了中国经史的根本精神。只讲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而忽视历史的精髓,可谓顾于此而失于彼。从这一意义上说,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不正是在纠正中国史学现代化之主流思潮的偏失吗?他晚年“颓然沦为儒宗”,不正是因为他执着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吗?经学家的身份,使他对史学的现代性转换多了一份责任和关怀。

### 三、“历史民族之义”

章太炎所讲之史,重在致用,以民族主义为依

归,故有民族主义史学之称。“今之所谓民族主义史学,即章氏所言‘历史民族之义’”<sup>⑩</sup>。对此,已有学者撰文予以阐发。值得思考的是,作为现代性范畴,民族主义史学这一旗帜并非为章太炎所专有,梁启超等新史家同样以此相号召。那么,在民族主义史学问题上,章太炎与梁启超等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在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是倡导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人物。20世纪初,他以“新史氏”自许,又以提倡民族主义著称。1902年4月,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态度坚决地表示:“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sup>⑪</sup>以民族主义立国,梁启超在文化上寄望于史学。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sup>⑫</sup>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的发达,有赖于本国的史学。“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

- ①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王联曾记录,《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1934年10月。
- ②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诸祖耿记录,《制言》第55期,1939年8月。
- ③ 柳诒徵:《论大学生之责任》,《学衡》第6期,1922年6月。
- ④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诸祖耿记录,《制言》第55期,1939年8月。
- ⑤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王联曾记录,《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1934年10月。
- ⑥ 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载张昭军编《章太炎讲国学》,第171页。
- ⑦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载张昭军编《章太炎讲国学》,第166页。
- ⑧ 章太炎:《国学概论》,第2~4页。
- ⑨ 章太炎:《致柳翼谋书》,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63~764页。
- ⑩ 吴景贤:《章太炎之民族主义史学》,《东方杂志》44卷4号,1948年4月。
- ⑪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 ⑫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容缓者也”<sup>①</sup>。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虽尽读全史,“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于是,他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sup>②</sup>一唱百和,梁启超的呼声很快得到一批俊彦的应和。邓实进而发挥说:“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sup>③</sup>“无史则无国”,为了挽救危亡,从《新史学》到《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长期致力于创建中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提倡的民族主义,以新史学为基石,而此新史学又以外来的史学理念为指导。由此出现一种悖论,他的民族主义史学带有较强烈的反传统色彩。

与梁启超相比较,章太炎提倡民族主义史学,其突出特色在提倡“历史民族之义”<sup>④</sup>。章太炎论史学,以“历史之陈迹”为基础,历史、史籍与民族主义构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

第一,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史学建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历史民族之义”与《春秋》的“华夷之辨”一脉相承。据朱希祖笔记,章太炎年方十一二岁时,外祖朱有虔授读,时以“夷夏之防”启蒙:“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十九、二十岁时,章太炎“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sup>⑤</sup>。章太炎民族思想之发生,源自中国的历史传统,受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等人的学说以及史书的启发,而尤以《春秋》的影响为大。他说:“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重要者,厥维《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山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sup>⑥</sup>他的民族主义史学正是在继承和总结《春秋》等史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章太炎提倡民族主义史学,尊重中国历史传统,从《〈社会通论〉商兑》一文可见一斑。1903年,严复译就英人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社会通论》,

并加以序文和按语。严复以甄氏提出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为人类社会通例,认为“排满”属宗法社会之事,反对民族主义。1907年,章太炎著文予以商兑,对严复等人唯西方学说是瞻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该文指出,《社会通论》乃甄氏以欧美古今事状为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规则,严复“于旧邦历史,特为疏略”,“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章太炎认为,民族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当以中国历史为准,而不能以所谓的公例条例为断,甄氏所论不合中国实际。“夫不欲考迹异同则已矣,而复以甲之事蔽乙之事,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sup>⑦</sup>。他尤其强调:“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sup>⑧</sup>民族主义史学若脱离民族的历史传统,民族独特性则无从得以确立。较之梁启超等人,章太炎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史学更好地体现了史学与历史的统一性。

第二,“历史”乃民族构成之要素,“国有与立”之柱石。章太炎与梁启超虽都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告诫“无史则无国”,但二人所言之“史”的内涵以及得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有实质性不同。梁启超用以建构民族主义的“历史”乃源自西方的新史学而非中国固有的旧史学,“无史”指的是中国没有新史学。与之相反,章太炎所说的“历史”则是自古相传、作为记忆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旧史,历史与史籍相互依存,一定意义上是重合的。在章太炎看来,这种历史的存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民族国家得以延续的前提。他在《哀焚书》一文中写道:“今

①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②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卷13期,1902年9月。

④ 章太炎:《致袁世凯书》,载《章太炎选集》,第557页。

⑤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期,1936年9月。

⑥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王謇等记录,载张昭军编《章太炎讲国学》,第140页。

⑦ 章太炎:《〈社会通论〉商兑》,载《章太炎全集》(四),第323页。

⑧ 章太炎:《〈社会通论〉商兑》,载《章太炎全集》(四),第331页。



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州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愤自立,且铲绝其由说邪?”<sup>①</sup>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一个民族国家之所以成立,在于它独具的特质:“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sup>②</sup>。在他看来,国之特性,即表现在历史和语言文字上。他晚年提倡尊孔读经,遭人误解,实际上,用心也在弘扬历史、宣传民族主义:“今吾人言读经尊孔,而敌人亦言读经尊孔,鳃鳃者深恐将来为敌人愚弄。吾谓不然。民族意识之凭借,端在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故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之道,严夷夏之辨”<sup>③</sup>。他晚年讲学,之所以再三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历史乃建设民族主义大厦不可替代的基石:“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sup>④</sup>。

第三,民族主义之发荣滋长,有赖于史籍所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之灌溉,故以读史为要。章太炎既以史书为民族主义之所托,故每当民族危机加剧,他便大力呼吁要重视历史的作用:“今当世界在较任何时期为严重的时候,历史上之陈迹即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用尤巨,故史志乃今日切要之学也”<sup>⑤</sup>。1906年,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章太炎提出“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主张用“国粹”来激发民族主义,唤起民族精神。这里的“国粹”,指的就是“汉种的历史”<sup>⑥</sup>。次年,他在《答铁铮》一文中以稼穡作喻,明确提出读史对于培养民族感情至为重要,舍弃历史,徒知主义,并不利于民族主义的生长:“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sup>⑦</sup>。20世纪30年

代,国难加重,章太炎愈益重视读史致用,不遗余力地宣讲历史之重要、读史之利益、读史之方法。他说:“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sup>⑧</sup>，“而国亡再起,非归功于史家不可。今者外患日深,骤图富强,谈何容易。惟有立定民族主义,晓然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之《春秋》,推至汉、唐、宋、明诸史,人人严于夷夏之防,则虽万一不幸而至下土耗敎,终必有复兴之一日也”<sup>⑨</sup>。读史寄托了章太炎复兴民族的厚望,成为一条重要的救国之路。而章太炎力倡所读之史,依然是包括《春秋》在内的旧史。

章太炎在近代史上以特立独行著称,其史学思想亦不例外。他一贯的“依自不依他”的学术风格以及他对西方现代性和普遍性的质疑,均与他熟稔历史、强调从历史实际出发有密切的联系。他提出的“六经皆史”以及主张的民族主义史学,把中国史学传统、社会现实与西方理论结合在一起,融会民族性与现代性,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章太炎不以史名家,但他对中国史学现代性的思考,富有启示,发人深省。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史学与中国形象的重构”(项目号:13JJD770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号:NCET-10-025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 ① 章太炎:《馥书·哀焚书第五十八》重订本,载《章太炎全集》(三),第323~324页。
- ② 《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诸祖耿记录,《制言》第25期,1936年9月。
- ③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王謇等记录,载张昭军编《章太炎讲国学》,第166页。
- ④ 章太炎:《与张季鸾》,载《章太炎书信集》,第957页。
- ⑤ 《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王联曾记录,《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1934年10月。
- ⑥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 ⑦ 章太炎:《答铁铮》,《民报》14号,1907年6月8日。
- ⑧ 章太炎:《论读史之利益》,载张昭军编《章太炎讲国学》,第168页。
- ⑨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王謇等记录,载张昭军编《章太炎讲国学》,第166页。